



党员领导干部能力素养大课堂

党员领导干部

十七堂哲学修养课

周国平
傅佩荣

等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党员领导干部十七堂哲学修养课 / 周国平等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075-3083-4

I. ①党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哲学—干部教育—学习参考资料
IV. ①B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5438 号

书 名: 党员领导干部十七堂哲学修养课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3083-4

作 者: 周国平 傅佩荣等

责任编辑: 宋军占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 编辑部 010-583362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787mm × 1092mm 1/16 开本 18 印张 224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代序

中国哲学的未来

任继愈

一、中国哲学的特点

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，在 1903 年以前都没有，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。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，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。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，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，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，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，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。古希腊有“爱智”，“智”包括很广，社会、政治、自然、还有哲学都属于“智”。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，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，这是研究人的问题。提出人要认识自己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人类要生存，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，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。人的衣食足了以后，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，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。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是很大的进步。

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，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。每一个民族都



司马迁像

司马迁（前145—前87），字子长，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，夏阳龙门（今陕西韩城南）人。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

有自己独特的文化，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。比如诗歌、舞蹈、饮食、服装，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。但是哲学不同，哲学是抽象思维，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，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。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，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，没有文字的民族就

没有哲学，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。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，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、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，但是对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。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，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。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，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这是它的任务。哲学究天人之际，将自然、社会、人生都包括在里面，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，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，就会出问题。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，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。哲学能盖工厂、盖房子吗？都不行。但哲学与社会活动、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，如果哲学脱离社会 and 现实生活，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，那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，就不够格。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

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。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这是最高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，很多哲学家、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，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？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，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，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。

在西方，中世纪的时候，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，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，哲学是神学的奴婢，神学统管哲学，哲学比神学低一层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，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：自然科学分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等，哲学也分美学、伦理学、认识论、价值论、方法论等等。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？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，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，手工业开始发展，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，劳动者集中，分工细致，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，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。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，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，缺少西方的“越分越细”的一个历史的过程，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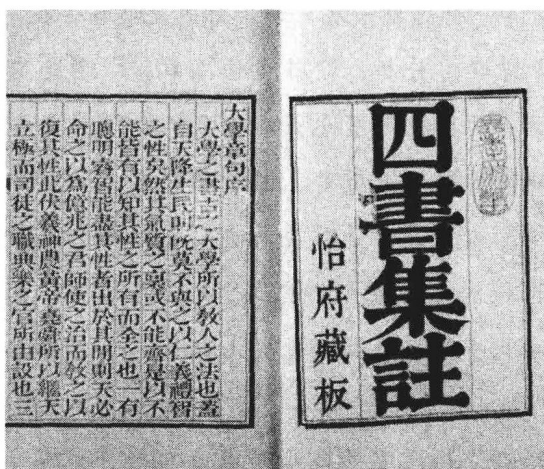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哲学讲综合，西方哲学讲分析，这种说法不算错。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，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，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，因此它讲“分”就讲得少，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，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，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。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，西方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，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。

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。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，教权、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，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，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。拿破仑在欧

洲是英雄，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，皇帝地位才合法，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。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皇帝是天子，天子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宗教的名称。在外国天子是耶稣，国王不是天子。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。10 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，“四书”代替了“五经”，成为全国通用教材，任用官员必须经过“四书”的考试，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，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。多民族、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，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，只有中国是最好、最强的，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。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，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。这时中国是靠圣人、圣君来治理国家的，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，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，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。但在中国古代，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，不能改变，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。比如说孝，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，问这个问题本身

就有罪，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。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，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。

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，政教不分、长期统治，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——考试内容、教学内容陈旧，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，自我封



“四书”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这四部著作的总称，它是公认的儒学经典，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。

闭。从鸦片战争以后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，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，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。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，从南往北产生影响。太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是广东人，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，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。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，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，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隔绝保守。近代以后，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二、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

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发展阶段，可以分三个时期。

第一个阶段是导源期。这个阶段提出了好多问题：人类责任、人类社会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。导源时期哲学家们对人和天（包括人对自然）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，有的哲学家说天是不可抗拒的，是最高的命令者；也有的哲学家说人可以胜天。还有人性问题的争论，有的说人性善，有的说人性恶。这些争论都没有确切的结论，但是都涉及了这些问题。代表人物就是孔、孟、老、庄。孔孟算一个大的流派，老庄算又一个大的流派。孔孟更多是从政治和统治阶层方面讨论问题，怎么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。老庄注重自然，主张政府少干涉个人，希望个人的思想、行动自由多一些。后来有很多“家”，基本上从这两个主流派生出来的。我有文章讲过，孔孟是代表从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观察世界，提出方案；老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，怎么样能过得自由一点，不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。后来孔孟代表在朝的方面多一些，老庄代表在

野方面多一些。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同样一个人在朝的时候就讲孔孟，被贬官到了外地或者不当官退休了就讲老庄，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想。像苏东坡、白居易，也在过朝、也在过野，他们既崇孔孟，也崇老庄。

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，哲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，奠基期。奠基期是从秦汉开始的，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。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列国分立，诸侯国家很多。武王伐纣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参加，到了春秋只有几十个国家，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，国家之间最后兼并成一个国家——秦。秦朝统治时间很短，汉朝继起，统治时间长一些。

这个时期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大国，这是顺应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。因为在战国时期，没有一年不打仗，老百姓不得安宁，战胜的也有损失，战败的损失更大。当时百家争鸣，许多学派提出不同主张。归纳这些不同的主张，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样治理天下。当时的天下不是指现在的世界，是指国家，如何把国家治理好、管理好。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，他们都在讲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，有一些主张强硬一点，有一些主张缓和一点，不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统一，诸子百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趋势。

国家统一以后对哲学有了新的要求。秦汉统一非同寻常，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了，南方从长江流域延伸到珠江领域，北方是黄河领域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要实行有效管理，怎么把它管好？汉武帝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方法，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运而生。这种学说认为天跟人是一个整体，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天地，天上（自然）有的，在人身上也有所体现——人的眼睛代表日月，血脉代表江河，毛发代表草木森林，天人是相配的。因此人做好事上天会有所反映，人做坏事上天会有所告诫。即使是皇帝，施行的政策好，

上天就会有祥瑞，施政不好，上天就有灾难。这一学说对统治者的作为也有所制约。

阴阳五行是基于天人感应说法的一套框架。金木水火土，有互相克制的作用，也有互相辅助的作用。金克木，这是从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，金属的刀子可以砍木头，水可以克火，火可以克金；反过来木可以生火，火可以生土，土可以生木。五行相生相克的知识作为一个框架，可以推广解释其他现象。比如说中医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决治病的问题，人的脾胃属土，肝属木，肾属水等等。还有朝代的更替也是用五行来说明的。秦朝五行占水，接下来的汉朝就把自己作为土的象征，土可以克水，水来土堰。而且颜色也不一样，秦朝上朝以黑色为尊贵，汉朝则以黄色为尊贵。这个体系从汉朝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解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，给现实提供一个框架或说明。今天看来这种说明很粗糙，也不科学，可是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它能够解答问题，成为一个体系。阴阳五行学说被董仲舒建立以后，长期影响着社会，这是现实社会的产物。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这么一个哲学，这个哲学可以解答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，这是第二个时期。

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时期。中国统一以后，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，战国时期的弊端没有了，生产可以稳定了。像长江、黄河这样的大河如果发生灾难，可以全国统一治理；外来的侵略可以全国组织力量抵抗；像长城，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兴建。这样物质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跨越。从汉朝开始，国家开始兴办学校，还开辟了丝绸之路，对外交流使人们眼界扩大了。但是从秦汉到宋朝，威胁统治的问题不是出自下层的老百姓，而是出自上层统治者之间，他们不断发生宫廷政变，这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制度和体系。从宋朝开始，哲学需要进一步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，所以对人类社

会的地位、国家的职能考虑得更多、更周到。比如说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中，“四书”比“五经”的内容浓缩了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加起来不到三万字。这就说明我们的哲学慢慢自“五经”集中到“四书”。

“四书”中的《大学》特别强调教育的三个主要原则，一个是明德，一个是亲民、一个是止于至善。完善你的人格，造就一个完整的人。有八个详细的条目，从格物开始，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这是内心的修养，推广开以后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从内部到外部，使整个社会有一个框架。《大学》给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摆正了地位，制定一个制度，这个变化是宋以前没有的。从宋以后，《大学》从上到下的中心思想，一个是忠，一个是孝，这两个观念深入千家万户，如果你不忠不孝，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身之地。客观上这是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要求，能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。忠孝两个观念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路强调下来的，这两个轻重关系有点变化。在汉魏以前，孝比忠的地位更重要一些。管仲参加战斗时经常打败仗，不是他没有勇气，而是家里有老母要照顾，不能拼死一战。可见那个时候，忠与孝相比，孝更重要。后来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，当忠孝产生矛盾的时候，孝必须让位于忠。这也说明国家越来越集权。在汉唐的时候，君臣是坐而论道，都是坐着讨论问题。到了宋朝，宰相以下包括宰相没有坐着的。朱熹当过皇帝的老师，他老是发议论，皇帝不喜欢他，给他写了一个客气的指示，说你年纪大了，讲课也很辛苦，你以后就别来了，就辞退他了。到了明清以后，君臣会面时站着都不行了，臣要跪着，跪着就不是讨论了，就是听命令。所以君权更集中，哲学进入了最后的停滞时期，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统一，综合国力比较强。可是从明朝中叶以后，科学已经开始停滞不前，以前中国的科学是世界领先的，宋以后就开始停

滞了，到明以后天文历法日食月食都算不准了，西方的科技开始超过了我们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了。

三、中国哲学的未来

中国哲学的前途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合在一起的，因为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实际，离不开社会问题，哲学必须结合实际。马克思没有说讲哲学原理，他的《资本论》就体现了哲学，具体地分析，实事求是地来说明一个社会，他不会回避问题。

我认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就是我们正在吸收各种文化，总结自己的文化，来展望未来，创造未来。将来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，应该是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的文化融合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，现在它正在形成中，还很不成熟。因为第一，中国自己的哲学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们有几千年的哲学没有整理透。有一些哲学家个人的著作里面写出自己的看法，真正讲到一个哲学应该是有生命的，有很多人接受它，很多人支持它、了解它，这样的哲学寿命就长，一个哲学家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，但是不能指导社会。中国现在首先要积累资料，这是第一步，有了完备的资料，下结论可以放心，中国自己正在做。外国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比中国哲学知道得更少，因为留学生到外国去要看当时流行的思潮，是什么思潮才带回来什么样的思潮，这是照搬。我们也照搬过不少，但是都是不成功的。哲学不是靠照搬，而是要靠实践的考验，哪些是正确的，哪些经得起实践的考验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经过近代到现代，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，也是走越分越细

的道路。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，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，试图解决人生归宿，终极精神安慰等人人都会遇到的困惑。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，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、解释。人生终极精神追求由宗教去解决，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。本来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学问（哲学）都逐渐脱离生活，陷入到概念分析、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。

中国哲学本来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，它一直干预生活，在古代曾起过重要作用。进入近代社会后，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的影响，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，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，轻视科学技术，以贫困为荣，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诱因，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净化思想的课堂，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藪。在极“左”思潮泛滥时期，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，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，缺少对应的办法。对封建社会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弊不予重视，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。

中国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，因为我们有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，有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。文化遗产早已存在，只是过去没有科学地对待它，有时捧到天一样高，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；有时贬斥得一无是处。这两种偏向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切身经历。文化有继承性，不能白手起家，传统文化是抛不掉、打不烂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曾捣毁曲阜孔庙，这种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。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，我们责无旁贷。

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，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，还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。为了鉴别取舍，我们要提高文化识别本领，才不致上当受骗。有的人到外国取经，取经者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，取

回的未必是真经。即使是真经，他们用得上，拿来是否对我们适用，还要通过实践检验。“五四”以后，我们有成功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。

西方哲学发展，由浑沦到分析，又由分析到综合，看来这是21世纪的大致轮廓。对中国哲学来说，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、综合，认为它们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，这是一种误解。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《易经》早已讲过了；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，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。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。从原始浑沦的统一，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，再进行综合，这个否定之否定（黑格尔说的正—反—合）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。融会中西，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，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，今天要以崭新面貌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，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，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。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，深入生活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，使人性的优点、特点得到充分陶冶，全面发展。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，最大的精神安适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，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。如果不图侥幸，不靠神仙皇帝，那只有靠哲学，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。我相信，到了大同社会，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，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展。

哲学的使命是指导整个人类怎么生活，不是指导哪一个人；使整个社会，整个人群受益，不是哪一部分人受益。过去董仲舒指导汉朝四百多年，现在我们的哲学应该有更长久的效益。未来是酝酿和准备阶段，我们正在转型之中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把转型期的工作做好。

目 录

CONTENTS

代序：中国哲学的未来	任继愈 / 001
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	汤一介 / 001
价值·权威·传统与中国哲学	陈 来 / 020
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	张立文 / 035
中华和合文化及其时代意义	蔡方鹿 / 050
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	周国平 / 061
漫谈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	蒙培元 / 074
儒家的和谐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	黎红雷 / 085
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	傅佩荣 / 096
黄老哲学与生命智慧	张绪通 / 110
道教与 21 世纪	葛荣晋 / 141
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	方立天 / 161

禅与生命体悟	楼宇烈 / 184
当代马克思主义：坚守“内核”，放宽“外围”	童世骏 / 198
美国梦，欧洲梦和中国梦	赵汀阳 / 214
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？	张志伟 / 241
论爱与自由	黄裕生 / 261



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

汤一介

汤一介 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，原籍湖北省黄梅人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文化书院院长、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、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。著有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、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》、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》、《在非有非无之间》、《非实非虚集》、《昔不至今》、《郭象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、《生死》等。